

2019年第3期(总第3期)

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STUDIES
REVIEW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议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一、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议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近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全球化智库等场合发表演讲、接受媒体访谈及智库撰文中谈及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认为美国对华负面认知在不断深化，对华战略也在发生变化。美国应谨慎制定对华政策，中国也应向积极面调整外交政策。两国应加强管控分歧、搭建沟通桥梁、深化合作，使世界变得更安全、繁荣。主要观点汇总如下：

美国对华的负面认知在深化。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和态度的改变并不是2016年大选的结果，而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已在发生。2020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对华态度会比特朗普更加恶劣，就像比尔·克林顿批评老布什、奥巴马批评小布什、特朗普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态度太温和、太软弱一样。商人和企业家原本是美国最主要的对华友好群体，但现在他们越来越认为在对华投资和合作中受到了不公待遇，而中国的开放意愿在减弱。基于近年中国在南海筑岛、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控制意识形态等行为，其他国家也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对外界的包容性下降。这一切都使美国认为对华谋求共存与合作的宽松外交政策已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变化。这些都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整体态度转变，中国须正视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贸易协议无法支配中美关系。贸易战同核战一样，没有赢家。贸易战最大的后果反映在心理层面，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新的贸易协定并不能帮助美国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有种观点认为扩大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就可以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但事实上，缩

小贸易逆差并不会给美中就业形势和总的贸易均衡水平带来太大变化。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或向中国政府施压促其不再向本国企业的大规模技术开发提供扶持可以解决美中之间的技术问题。但是，当今有数万中国公民在美国学习或为从事技术开发的美国公司工作，美国不可能做到让中国人无法接触美国的知识，中国政府也不可能放弃对技术开发的支持。美国不应对中国采取威吓策略，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不会产生多大效果，更是因为它也会削弱美国对华经济杠杆的有效性。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日本、印度等很多国家的影响，美国应思考如何发挥自身独特作用，一方面推动中国履行贸易义务，一方面重新规范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同时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而不是指望在谈判桌上取胜。

美国应谨慎制定对华政策。美国对开展合资行为、信息技术分享带来后果的担心是合理的，但美国不应简单将经济失败归咎于中国，中国即便满足美国所有经济方面的要求，美国的GDP也不一定能够涨1%。“中国冲击”理论是错误且不完整的，因为其并没有考虑到其它因素。中国科技迅速进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而是中国有了了不起的企业家、优秀的教育系统和政府的大力投资。数字技术的普及已很难保证技术被一方完全控制。中国应反思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欠缺，美国也需谨慎思考对华政策，拒绝进入中国市场和拒绝承认中国的技术进步无助于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如果美国的经济政策是为了服务那些不支持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的群体，是为了增强美国内部对中国的抵触，那么美中贸易战就可能继续下去，而离对话交流的道路越来越远。短期来看，贸易战固然能增加美国的相对收益，而长远来看，美国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的预言很可能变成现实。

中国应调整外交政策。中国的确应在国际机构中扮演更加重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的角色，而不是仅去适应别人制定的国际秩序。但

这意味着，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阶段，美国可以接受中国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接受了，比如技术征用、贸易补贴和市场倾销行为。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的状态了，既已融入国际体系，就要接受这个体系的规则。美国认为信息技术是打开政治自由化大门的主要力量，但事实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在中国产生美国期待的效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中国一方面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才能享受的特殊保护，另一方面又希望依靠强劲的增长重新定义地缘政治和国际规则。过去两年，美国与盟友之间产生了分歧，因为中国为美国和美国盟友创造了不等的机会。若这种裂痕不存在，对中国的孤立将是全球性的。所以中国不应低估美国的力量，应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同时，中国要想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就得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以有力的方式推进改革。

维护好中美关系须采取行动。维护好中美关系需要两国认真回应对方的诉求。美国需要让中国知道美国愿意让中国塑造自己的经济未来，而不必要压制中国。中国需要向美国保证，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不会、也不想取代世界舞台上的其他角色。美中双方不应该局限于贸易问题，而应更多去探索两国关系的长远未来，比如说思考在东北亚安全、数据交易规则、政府行为、网络冲突管理等问题上各自应承担怎么样的责任。美中两国有重大的共同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多于分歧，包括应对气候变化、防扩散、反恐、防治传染病、人类脱贫等。如果两国能够很好地管控分歧，搭建好沟通的桥梁，必能携手打造更美好的世界。

文献来源：2019年3月22日，在全球智库演讲《对中美关系的四个观察》，

https://www.guancha.cn/LaoLunSiSaMoSi/2019_03_30_495658_2.shtml;

2019年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演讲，

<http://cdf.cdrf.org.cn/cdf2019/xwbd/8507.jhtml?shae=true#content>;

2019年2月22日，中国工作室对萨默斯采访，

<http://www.crtv.org.cn/djbd/2019/0222/7967.html>;

2018年10月12日，《中国经济报告》对萨默斯专访，

http://www.sohu.com/a/258987893_485176;

2019年2月4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贸易协议无法支配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no-trade-deal-can-dictate-our-relationship-with-china/2019/02/04/ff5ea754-28c4-11e9-8eef-0d74f4bf0295_story.html?utm_term=.ce8b9d9bb23b.

二、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1、美国应遏制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战略发展。中国在斐济、库克群岛、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发展基础设施项目的目的与在吉布提类似，都是为加强军事战略优势，以支持中方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如果美国不能整合政府之力对抗中国的军事意图，美国及其盟友将失去全世界最大水域的商业准入资格、军事航行自由的权利及战略影响力。美国应改革官方发展援助战略，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企图。具体包括，合并官方发展援助项目机构或设立具有内阁级地位的领导机构；围绕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开展新的援助项目；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联盟，以联盟力量介入该地区；将官方发展援助纳入国家级安全战略。

——美国哈德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李发表报告《利用援助对抗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吉布提战略”》，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4892-the-use-of-aid-to-counter->

china-s-djibouti-strategy-in-the-south-pacific

2、意大利在内外因素的考虑下转向中国。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意大利一直将自己视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即使在冷战期间，意大利既能从美国获得支持，也与苏联保持着良好关系。当前意大利在经济上遭遇危机，因利比亚战争而感到遭受美国背叛，因移民和财政问题遭受欧洲背叛。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当前意大利国内政党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分歧。大多数认为，中国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开发提高地中海作为中国进出口中心的重要性。如果未来新铁路的开发将比港与欧洲中心连接起来，位于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意大利港口可能会被取代。因此意大利需要将其港口与铁路网协调起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而主要反对的声音来自贝卢斯科尼，他声称在美国和中国的对抗中，意大利和欧洲应支持美国。

——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院学者费代丽加·宾迪，《中国与意大利的历史联系（以及一些便利的健忘症）》，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3/21/of-italy-and-china-and-historical-ties-and-some-convenient-amnesia-pub-78662>

3、新西兰恐袭反映西方陷入极右势力抬头的困境。在西方各国，反仇视穆斯林的犯罪和暴力袭击呈上升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有三个因素。第一，在政治上，西方两极分化造成的不安全感已经围绕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带来的影响）而发酵。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将移民当作对西方身份认同的威胁。“伊斯兰国”的崛起及伦敦、巴黎等地的恐怖主义活动不仅证实了这种担忧，还使得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第二，对移民的不满和恐惧已变为条理清晰的政治意识形态。极右翼阵营告别传统对种族的关注，转向“身份认同主义”，保护所谓

欧洲身份不受“非欧洲”文化侵犯。第三，“网络钓鱼文化”成为极右主义者聚集和动员的平台。极右势力的崛起不仅威胁到生命，而且将破坏西方社会赖以存在的多元主义和自由。西方国家的决策者需严肃对待这一问题。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安全研究学教授、极端化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创会主任彼得·诺伊曼，《西方陷入极右势力抬头的困境》，《新西兰先驱报》3月20日，

https://www.nzherald.co.nz/nz/news/article.cfm?c_id=1&objectid=12214584

4、新轴心挑战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的“三驾马车”。新的“卡塔尔-伊朗-土耳其”轴心已在形成之中，新轴心将有能力控制亚洲、印度西部和巴基斯坦。2017年以来，沙特及其它海湾国家的封锁行动让卡塔尔迅速倒向土耳其和伊朗。国际压力和经济制裁促使三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开始在经济领域恢复友好关系，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地缘政治分歧。卡塔尔强大的金融资源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将帮助联盟在动荡中谋求地缘政治主导地位。让所有反伊朗国家担忧的是，这一联盟很可能会得到俄罗斯及其军队的支持，而俄罗斯、伊朗和卡塔尔拥有世界已知天然气储量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未来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行动，美国无疑将努力打破这个新兴的三国同盟。

——新西兰法律和政治分析师达留斯·沙塔马塞比，《新的“土耳其-伊朗-卡塔尔”轴心正在中东崛起，这让沙特怒不可遏》，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3月22日，

<https://www.rt.com/op-ed/454512-alliance-iran-qatar-turkey-saudi/>

5、取消对朝制裁会削弱美国立场。第二次特金会后，首尔和华盛顿都认为谈判在走下坡路，有必要给这个体系注入新的冲击。然而

特朗普突然推翻拟议中的一揽子制裁措施，美国政府都感到吃惊和困惑。传统基金会朝鲜问题专家、前中央情报局朝鲜司副司长布鲁斯·克林纳认为，特朗普宣布这一消息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可能会损害其高级顾问和助手在朝鲜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眼中的地位。政策上如此迅速的转变令人怀疑他们的言论是否会马上被特朗普推翻。

——《特朗普笨拙地向朝鲜伸出橄榄枝》，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3月22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3/22/trump-offers-clumsy-olive-branch-north-korea-sanctions-treasury-bolton-policy-reversal-on-twitter-pyongyang-nuclear-talks/>

6、打赢对华新冷战只能依托经济手段。不同于美苏冷战，中美是两个相互关联且与世界深度融合的经济体。当今最具决定性的争夺将发生在经济领域（贸易、技术和投资）。一些美国战略思想家已经认识，美国要想赢得这场冷战，就必须切断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并说服其盟友也这样做。但这种做法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要求美国不仅要承担自己的损失，还要对盟友损失进行补偿。在5G争夺中，美国的盟友在所谓“安全威胁”和技术推迟的成本之间犹豫不决，美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奖励或补偿的意图。相反，在对钢铁和铝制品征税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已表现出对盟友经济利益的漠不关心。美国与盟友在经济领域的斤斤计较，实际上是在自我裁减军备。

——美国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教授裴敏欣，《新冷战的高昂代价》，捷克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3月14日，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ld-war-us-china-trade-allies-by-minxin-pei-2019-03>

7、腐败问题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腐败现象在美国社会体制中普

遍存在。任人唯亲、“通俄门”、“封口费”等事件反映出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的腐败，这只是美国普遍腐败现象的一个缩影。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关键金融机构内部的系统性腐败；波音737 Max事件中联邦航空局对波音公司极力袒护；近期大学招生丑闻中富裕家庭与学校管理者串通一气。这些腐败丑闻反映了美国社会制度中效率低下、资源分配不合理的一面。为对抗腐败，就必须施以更多监管，但监管制度本身会消耗更多成本，进一步降低行政管理效率。在此背景下，愤怒的民众转而支持承诺改变体制的候选人也就不足为奇，这就是伯尼·桑德斯之类候选人受到欢迎的原因。腐败还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使盟友对美国兑现承诺的能力失去信心。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America's Corruption I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3/19/americas-corruption-problem-is-a-national-security-threat/>

8、中美俄太空竞争反映战略竞争的复杂化。冷战是两个各自拥有强大意识形态的联合阵营之间的正面对抗。但外太空竞争要更为复杂，对抗多种多样，挑战不仅涉及到战略方面，还涉及到环境、经济与贸易。当前在外太空的局面并未像冷战期间那样激烈，但大国间对立与冲突导致迄今未达成一份牢固的协议控制太空军备竞赛。美国并不掩饰其试图“统治太空”的意图。如果站在军控角度来看，目前仍存在三方面有利因素：第一，美方意图可能会推动其他国家寻求共同遏制太空霸权企图。第二，太空挑战的战略重要性今非昔比，各国已逐渐意识到这种重要性并形成广泛认同。第三，越来越多国家涉足太空事务并互相依赖。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合作研究员、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主席军事顾问菲利普·施泰宁格，《太空竞赛是否反映了战略

复杂化?》,

<http://www.iris-france.org/133531-la-competition-spatiale-reflet-dune-complexification-strategique/>

9、推动以色列建立针对中国投资和技术的监督机制。中国在以色列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先进技术,并利用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色列则寻求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联系,推动市场多样化,避免外部市场局限于欧洲和美国。中以关系新动向可能导致以色列与美国利益产生分歧,中国在以色列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则可能引发政治和安全风险:中国技术设备会引发网络安全及间谍风险;中国涉足的商业港口与以色列海军基地相邻,给以色列和美国带来严重安全隐患。以色列应从两方面加强对华政策,深入了解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制定对策。对此美国可以提供帮助,美以两国应制定并推进双方均能接受的对华议程,将中国相关议题纳入常规讨论和决策中。确保定期共享信息,对中国在以色列及中东的经济活动进行联合监测。

——兰德公司专题报告《The Evolving Israel-China Relationship》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641.html

10、5G 影响大国间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的竞争。5G 将实现超高速、大容量和低延迟通信,应用于无人驾驶、工厂自动化和智慧城市等领域。掌握 5G 技术可获得政治和经济优势,5G 成为中美贸易和技术对抗的中心。在 5G 竞争中,美国保持创新优势,中国获取应用先发优势。由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和盟友反对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硬件。在分化的 5G 竞争中,第三国将做出艰难的选择。一部分政府可能会受到美国和盟国压力,避免依赖中国的 5G 技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考虑成本寻求中国技术支持。中国在 5G 中的

先发地位可通过“一带一路”方式转化成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地缘政治优势，美国的阵营中没有类似举措来扩大其在全球的技术影响力。

欧亚集团（由保罗·特里奥罗和凯文·艾莉森撰写）2018年11月15日发布报告《5G与地缘政治》

<https://www.eurasiagroup.net/live-post/the-geopolitics-of-5g>

本期责编：安刚、周武华、许馨匀

支持单位：参考消息报社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办公地点：清华大学明斋 217

联系电话：010-62771388

电子邮箱：ciss_thu@163.com